

天津近代 教育制度史

王慧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天津近代 教育制度史

王慧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津近代教育制度史 / 王慧等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660 - 6

I. ①天… II. ①王… III. ①地方教育—教育制度—教育史—
研究—天津—近代 IV. ①G52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947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明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8.5
插页 2
字数 453 千字
定价 11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天津近代教育专题史研究”（TJJX13—012）、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天津近代教育史专题研究”（GE4010）成果。

序

欣闻《天津近代教育制度史》即将出版，实在可喜可贺。为什么呢？一是因为“近代中国看天津”，近代天津的新式学堂出现早，发展快，类型多，有许多有特色、有影响的学校，值得好好深入研究；二是因为天津地方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需要充实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欣慰的事情。

地方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是教育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阐明一定区域教育的产生、发展和变化，有助于发掘和整理地方教育史志资料，梳理各个时期教育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深化教育改革，对于存史、育人、资政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本书的研究主题突出，逻辑线索清晰，特别在史料的挖掘上下了一番功夫，运用了很多历史档案、报纸杂志等一手资料，比前人的同类研究有所突破和完善，值得学术界关注。

作者王慧是我的学生，多年来，难得她一直心系中国教育史，倾心教学与研究，希望她能再接再厉，在这个领域取得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国国华
2017.1.22

(作者系著名教育史学家、河北大学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天津近代教会教育	(7)
第一节 教会教育兴起的原因	(7)
第二节 教会学校的发展轨迹	(10)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办学概况	(28)
第四节 教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70)
第二章 天津近代学前教育	(75)
第一节 学前教育产生的背景	(75)
第二节 清末的学前教育(1860—1911)	(77)
第三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学前教育(1912—1926)	(84)
第四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学前教育(1927—1949)	(91)
第三章 天津近代义务教育	(111)
第一节 义务教育兴起的背景	(111)
第二节 义务教育的历史演进	(113)
第三节 义务教育的经费	(128)
第四节 义务教育的师资	(134)
第五节 义务教育的课程和教材	(147)
第四章 天津近代普通中学教育	(156)
第一节 普通中学教育兴起的原因	(156)
第二节 普通中学教育的发展进程	(159)

第三节	普通中学的行政管理	(175)
第四节	普通中学的办学概况	(180)
第五章	天津近代高等教育	(198)
第一节	高等教育兴起的背景	(198)
第二节	高等教育的萌芽(1880—1894)	(201)
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奠基(1895—1911)	(207)
第四节	高等教育的转型(1912—1927)	(216)
第五节	高等教育的繁荣(1928—1937)	(224)
第六节	高等教育重创与重建(1938—1949)	(232)
第六章	天津近代留学教育	(238)
第一节	留学教育兴起的原因	(238)
第二节	留学教育的历史演进	(240)
第三节	归国留学生对天津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266)
第七章	天津近代师范教育	(278)
第一节	师范教育的萌发(1903—1908)	(278)
第二节	师范教育的转型(1909—1927)	(292)
第三节	师范教育的调整完善(1928—1937)	(304)
第四节	师范教育的重创与重建(1938—1949)	(313)
第八章	天津近代职业教育	(323)
第一节	职业教育产生的背景	(323)
第二节	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326)
第三节	职业教育的行政管理	(350)
第四节	职业教育的学校管理	(357)
第五节	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历史作用	(363)
第九章	天津近代社会教育	(369)
第一节	社会教育产生的原因	(369)
第二节	社会教育的萌芽(1860—1911)	(372)

第三节 社会教育的确立(1912—1918)	(377)
第四节 社会教育的发展(1919—1926)	(383)
第五节 社会教育的繁荣(1927—1936)	(398)
第六节 社会教育的维持(1937—1949)	(414)
结 语	(426)
参考文献	(432)
后 记	(449)

绪 论

天津——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历史文化名城。

她位于华北平原九河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汇合处和入海口，素有“九河下梢”“河海要冲”之称。

唐朝时这里被称作“三会海口”，即大运河与海河及渤海湾交汇的地方^①，南北汇通，水陆交通便利，漕运、盐业发达。1153年，金海陵王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所需粮食、丝绸等物资都通过运河运抵中都，而位于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便成为漕运的重要枢纽，金朝政府在此设有粮仓，为保障物资运输的安全，特设“直沽寨”，派兵戍守。元朝时，直沽仍是漕运中转的枢纽，延祐三年（1316），直沽寨改为“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兵民杂居”，人口稠密，在诗人张翥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罍越布满街衢”的繁荣景象。明朝建立后定都南京，明成祖朱棣久居北平，由于直沽地处“水陆咽喉”，而且又是他当年率兵渡河、取得胜利并成为“天子”的地方，于是，永乐二年（1404）在直沽设卫，并赐名“天津”。翌年设天津左卫，转年又增设右卫。明中叶以后，随着河海交通航运的发展，天津的商业贸易日渐繁荣，是北方商品的集散地，到明中叶天津已经发展成为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北方的商业中心。明清之交，天津的商业和城市已经相当发达，据清康熙年《天津卫志》记载：“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咸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所杂处……名虽曰卫，实在一大都会所莫能过也。”^① 顺治九年（1652），三卫合一，归并于天津卫。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卫为天津州；雍正九年（1731），又晋升为天津府，全面提升了天津的政治、军事地位。

此外，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要冲”^②，既是出海通道，又是安全屏障，自辽代以后，是守卫几朝首都的“京畿门户”，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教育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

马克思曾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③ 19世纪60年代，天津被迫卷入世界经济的旋涡，正是由这个生存原则所决定的。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物理、化学、生物等近代科学技术取得了空前成就，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而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已经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需求，为了寻找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西方殖民列强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扩张，将魔爪伸向了中国——一个沉睡着的古老东方大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从此，中国从一个闭关自锁的封建大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一批开放的通商口岸都在南方，帝国主义列强又把魔爪伸向位于北方的天津。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商业，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① 《天津卫志·序》。

② 同上。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就被帝国主义所觊觎、窥伺，1840年8月，英军曾入侵大沽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在这里大肆划定租界，开银行、洋行，控制海关，建教堂、学校和医院，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天津进行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天津成了帝国主义在北方盘踞的最大基地。从此，天津从一个封建的商业、交通枢纽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这也促使了天津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即从原来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变为以工商业为主，大量的外国商人和洋行涌入天津，大批国内外商品和原材料通过天津港运往全国和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增加，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口岸。

清末，西方列强横行中国，民不聊生，清政府统治内外交困，岌岌可危。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寄希望于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派非常看重天津的政治和地理位置，1867年，在津设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更名为“天津机器制造局”“北洋机器制造局”），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企业。同时，洋务派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工矿、轮船、钢铁、电报、纺织等民用企业，催生了天津近代的早期工业。

1902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推行地方自治，天津出现了两次民族工业发展的热潮。第一次是在清末，袁世凯为迎合“新政”，接受直隶工艺总局总办周学熙的建议，大力兴办工艺、工厂。在“大兴工艺”的推动之下，以轻工业为主的天津民族工业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从1903年到1913年，民族资产阶级在天津大量兴建工厂，资本在万元以上的约有32家，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铁丝铁钉厂、北洋火柴厂、北洋榨油厂等等。第二次是在“一战”期间，西方殖民列强忙于战事，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天津的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当时建了很多纱厂，到1922年，天津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棉纺工业城市。

在外力的压迫之下，天津逐渐偏离了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轨迹，工业、商业、贸易在全国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全国第二大商埠，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地位迅速提升，正所谓

“千年历史看西安，五百年历史看北京，百年历史看天津”^①。

三

近代的天津作为“京畿门户”，一方面，成为西方列强对华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和“救亡”“图存”的基地。从1860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始在天津兴办小学起，各类教会学校不断涌现，在纵向上建立了初、中、高三级学校体系，在横向上编织了覆盖普通教育、宗教教育、职业教育的教育网络。西方教会在天津办学长达百年之久，虽然以传教为目的，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色彩，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

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后，西方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洋务派与维新派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西学”上。洋务派于19世纪60—90年代，在天津集中兴建了一批洋务学堂，有天津电报学堂（1880）、天津水师学堂（1881）、天津武备学堂（1885）、天津西医学堂（1893）。1895年10月，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清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获准，成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里程碑。戊戌变法失败后，庚子国变爆发，清政府启动“新政”以求自救，教育改革一触即发。然而，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保守势力盘踞，在学习西方以及改革教育的进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而天津却凭借畿辅重镇的战略地位以及依托海河形成的码头文化凸显了巨大的包容性，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在学习西方文明、进行教育改革过程中占据了先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维新教育思想和“新政”教育改革的推动下，天津的各类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据《天津县新志》记载，1900—1911年间，天津共有各种类型的学堂共156所，包括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女学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工业学堂、农业学堂、

^① 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60页。

医学堂、艺徒学堂、半日学堂、半夜学堂等不同类型的学校，^①无论是学校的数量、规模，还是学校的类型、管理，都走在全国前列，在全国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成为我国近代新式教育的一个标杆，取得了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思考和总结，对促进当今天津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本书入选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天津近代教育专题史研究”（TJJX13—012）、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天津近代教育史专题研究”（CE4010）。本书采用历史法，以教会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中学教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专题为研究对象，时间段截取以上各类教育在天津的出现为起始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终止点。教会教育比较特殊，其时间段为1860年天津出现最早的教会学校——小书房，到1956年教会学校在天津消失。本书的“天津”是指自清末以来设置的天津县、天津特别市、天津市及其所辖区域。

本书在对大量史料进行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进行历史分期，并对每个时期发展的特点进行归纳，同时，对办学机构的行政管理、经费来源及使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与学生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力图较为全面、深入地展现天津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脉络和图景，进一步加深对天津教育近代化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对天津近代教育制度发展的特色、经验、不足及启示进行概括总结，为当今天津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选题新颖。本书系首次对天津近代教育制度进行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2）涉及面广。本书所研究的专题包括了除女子教育外所有的教育类型，拓宽了天津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范围。（3）结构严谨。本书所涉及的每个专题都从纵横两个方面

^① 张大民主编：《天津近代教育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进行研究，纵向上划分发展阶段，总结各个阶段发展的特点；横向上聚焦行政和学校管理机构、经费来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方法、教师与学生等问题，全面、深入剖析教育制度的各个基本要素，尽可能反映天津近代教育制度的真实面貌。（4）史料充实，史论结合。本书在史料挖掘上下了一番功夫，查阅了近代大量相关的档案、报纸、期刊和书籍，增添了不少新的史料，同时，不乏分析论证。本书以我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宏观背景为经，以天津近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教育实际为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论述天津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力求在理论层面上对天津近代教育实际进行精细剖析和人理论证，寓理论分析于史实之中，在史实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

本书的撰写者：绪论（王慧）、第一章（郑丽琴、王廷）、第二章（刘向军、张天征）、第三章（陈雅雯、王慧）、第四章（吴婷、王慧）、第五章（赵亮、刘兆宇）、第六章（李风、吴婷）、第七章（王羽、王慧）、第八章（顾安俊）、第九章（梁雯娟、王慧）、结语（王慧），全书由王慧统稿。

第一章

天津近代教会教育

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联军签订《北京条约》，天津被迫成为通商口岸，各国列强争相在此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其教会组织也蜂拥而至，建教堂，设学校，立医院。从1853年起，各国教会陆续建立了包括教会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具有相当规模且自成体系，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教育的近代化。

第一节 教会教育兴起的原因

1860年，天津出现了第一所教会学校，此后，教会教育在天津存在了100年。天津教会教育在天津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 教会传教活动此起彼伏

天主教是最早进入天津的教会组织，早在1847年法国神父卫儒梅进入天津传教。初期，传教活动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秘密进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借助《天津条约》的庇护才开始大张旗鼓地肆意扩张势力，他们强占土地建造教堂，拐骗、虐待中国儿童，极大地激怒了当地民众，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大肆烧杀抢掠，凭借着《辛丑条约》的庇护，天主教传教士的气焰再次嚣张起来，各国传教士利用赔款，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教堂，收买教徒，堂口数量从“1904年的7处增至1911年

的10处”^①。1912年4月，罗马教廷准许了林懋德（S. Jarlin）的建议，成立天津教区。新成立的天津教区有堂口13处，中外神父19名，修士修女共48名，并且拥有经费约银圆45万元。“天津教区成立后，天主教势力迅速扩张，据统计，1912年已有教徒34517名。”^②

基督教最早进入天津传教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柏亨利。1861年，英国圣道堂、伦敦会进入天津，他们凭借英国的侵略势力，强行购置房屋、土地改造、建造教堂，还以免费就医、入学的方式吸引民众入教。美以美会在1872年进入天津传教，修建教堂，开办学校和妇婴医院。吉瑞在1897年向华北年所做的会议报告中提到，美以美会在天津有11处礼拜堂，还有3个医院和药房，还有几个神学院、两个兴盛的膳宿兼备的男女中学，并有一些小学和一个女学道房。^③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伸入到直隶，矛头直指外国入侵者，教会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众人烧毁了教堂，各县基督教会也被迫停止活动。义和团运动极大地打击了教会势力，很多基督教堂化为灰烬。《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教会又开始强行扩充租界，重建教堂，扩建医院和学校，还有一些新的教派势力也迅速壮大起来。为了更好地利用宗教征服中国，各国政府对教会办学给予支持，教会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客观上为天津教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 扩大教会的影响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各教派凭借着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支持进行传教，但是效果并不明显。传教士被人民唤作“洋鬼子”，教士们或在街上散发《圣经》小册子，或赈灾布道，很难取得实际效果，于是教会就将目标转移到办学上。1866年，美国公理会创办教会小学，这是教会在津创办最早的学校。后来其他教会也积极参与办学，相继创办了成美馆、安立甘教会学校、法汉学堂等。这些学堂招收穷苦儿童，并且免学费，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② 同上书，第156页。

③ 刘清芬：《美以美会（卫理公会）传入天津和华北的概况》，载《天津宗教资料选辑》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提供食宿，这样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减小了传教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便于教义传播，扩大了教会的影响。教会办学“其志亦并不在于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①。教会采用办学方式进行传教，其效果远比传教布道要好得多，吸引了不少普通民众的孩子入教学习教义。

三 迎合洋务运动的需要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中一些官员开始意识到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扭转被动挨打局面，于是发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天津以其重要的区位优势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刚来天津时，听他布道的人寥寥无几，局面一直没有打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仍然没有起色，于是，他转变策略，迎合洋务运动的潮流，披起西学的外衣进行传教，果然奏效。从1880—1884年，他花费1000英镑订购了宗教、科技书籍和仪器，每月举行一场科学讲座，目的是通过传播西学让中国人接受“福音”。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教会意识到了，仅有小学程度的学堂是不够的，必须着手办更多的中学乃至大学，这样既能满足“洋务”的人才所需，也能让更多的人接受“福音”。

四 为了实现“中华归主”

随着对“洋务”人才数量需求的增加和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教会也越发意识到办学的重要性，《基督教中学之特殊的职务与目的》中提到：“中学教育之影响乃及于大部分的中等社会，此中等社会者，盖即目前教堂之所藉以发展得力者也，社会上超越之领袖虽非中学所能产出，但大部分基督教的社会强健的维持者，乃端由此中学供给之也。”^②尤其在清末“新政”以后，原来抵触教会教育的士大夫和富商

^① 李楚才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